

为人民立传 为时代高歌

——读李英报告文学《大国治村》

□潘江涛



乡村,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一个村庄承载的产业、生态、风气和贫富,无不反映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。

金华市作协主席李英‘非常敏锐和自觉地承担起表现人民群众在家园建设发展中的意愿、创造和经验’,推出近30万字的《大国治村》(2020年12月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),让读者真切感受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,中国乡村发生的‘真实生动的故事和变化巨大的图景’。这是李英继《感动之城》《让百姓做主》《第三种权力》之后的第6部报告文学,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。

武义后陈、永康塘里、东阳花园3个村,是金华媒体常年关注的‘网红’村,金华百姓耳熟能详,相对较为陌生的是淳安县的下姜村和临安区的上田村。但关心国事者无不知晓,下姜村曾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联系点,通过近20年的发展,精准扶贫的‘下姜模式’已成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典范。至于上田村,既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,又是浙江首个‘微法庭’的诞生地,一文一武,亦是名不虚传。

新闻是历史的初稿。后陈、塘里、花园、下姜、上田的新旧变化,既是时代的产物,又是民间智慧和力量的结晶。但毋庸讳言,这5个村的‘蝶变’时日,长的有二三十年,短的也有五六年了。李英是怎样解剖‘麻雀’,复活‘旧闻’,并引起读者共鸣的呢?

有人说,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‘锋利’,一是利剑,二是思想,而思想又比利剑更胜一筹。

特定的时代生活自有其相应的主题话语。《大国治村》紧紧围绕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’这一主线,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,浙江省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努力和成功经验,主旋律颇为强劲。

钱是一把双刃剑——既能发展生产、改善生活,又能让人坠落、甚至诱人犯罪。改革开放初期,武义县后陈村由农副牧业全面发展的‘红旗村’,渐变为全县闻名的问题村、上访村,原因就在于‘钱’。

“金钱是妖魔,是鬼怪,它会让好干部变坏。”这是作者李英的真切感受。而村民代表陈岳荣说得更直白:‘村里的钱是大家的、集体的,村干部哪能像花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,今天想吃就来吃,明天想喝就拿去喝,甚至连自己家里买把门锁都到村里报销,真是太目无法纪了!’时任武义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骆瑞生亦说:“显而易见,监督缺位就容易产生腐败。村两委既当决策者,又当监督者,一身二任,出现了监督的错位,其结果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些村干部,就会变成顺口溜所说的那样——初任村官是好人,真抓实干成能人,一经宣传成红人,放松监督

成狂人,发展下去变罪人。”

怎样防范好人变坏?后陈村成立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,时间是2004年6月18日。之后,因缘巧合,“后陈经验”遂成‘中国之治’。

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,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”东阳市花园村邵钦祥认为,法治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障,而颇具地方特色的《村规民约》也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利器,且应跟随时代潮流,或添加或删除,不断修订完善。

花园村建立全国首个村级工会,常年聘请法律顾问。32名村干部服务管理6.5万常驻人口,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就有5万多。“有事找干部,小事当天解决,大事3天解决”,已成花园村常态。即便是突发事件,治安和安保人员都能在5分钟内赶到现场。村里年年评选‘最美花园人’好人好报,德者有得’蔚然成风,连续30多年实现‘矛盾不上交、纠纷不出村、村民零上访’。2020年,花园村人均收入达14.2万元,“幸福花园”名副其实。

永康塘里与东阳花园仅一箭之遥,村民多为孙权后裔。当年,孙朝厅毛遂自荐,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他凭着个人魅力,“德润邻里”,带领村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引入传统文化根脉,让塘里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同频共振,比翼齐飞;而在《下姜起舞》中,李英从一户户村民家中的沼气池入手,勾勒出当地如何更新观念,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,下姜村也因此从“脏乱差”变成‘绿富美’。

报告文学是文学领域的‘轻骑兵’,最能贴近时代和反映现实。《大国治村》用感性的情感去注视值得褒扬或者需要鞭答的事物,用理性的思维剖析乡村事物背后的种种因素,字里行间弥漫着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如果说‘思想’是文章的灵魂,那么,糅合在段落间的人文历史,便是文章的血肉。

乡村不缺文化,但缺少文本。李英依凭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,细细探寻乡村治理的文化基因,格局虽小,但脉络清晰。无疑,此乃《大国治村》有望成为史志性作品的坚实基础。

“武义县历史悠久,唐天授二年(691年),析永康西境始置武义县,隶婺州。相传武则天执政时,新设郡县均冠以‘武’字,因县东有百义山,故名武义县(《花开后陈》之《上访村的阵痛》)。”

研读地名,颇有况味。“武义”与武则天有关,而“永康”,则拜孙权所赐。“永康古称丽州,始置县于三国赤乌八年(245年)。相传孙权之母吴国太因病到此(塘里)进香,祈求安康。吴国太病愈,孙权大喜,遂给此地赐名‘永康’,并单列为县。”

乱世红尘,苟且偷生。“永葆安康”,只不过是俗人的美好愿望。让人感佩的是,吴国太对孙权第六子孙休说的一番话:“吾辈贵为皇族,盛之极矣。然

易云‘亢龙有悔。故有其盛必有其衰也。若时不我与,尔可令后人迁栖此地,当可保我孙氏血脉发族延绵也。”

吴国太有此远见卓识,实乃平头百姓之福。然而,时至今日,塘里村虽说‘风水’不错,但在‘老孙头’没有毛遂自荐之前,不也是遭众人嫌弃的‘落后村’吗?村里的老房子低矮破旧,道路也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,连污水管道也埋不下去。”

如此一想,名称确实只是外在符号。就像花园村,倘若少了邵钦祥的强力统领,“村名花园不长花”,就一点也不意外了,即便邵氏颇有渊源。

“花园村是邵氏聚居地,建村已有700多年之久,祖上从河南博陵郡迁至东阳紫溪……他们开垦荒地,耕作薄田,以捉泥鳅、挑贩私盐、做草席为主业,惨淡经营,艰难度日,但花园村人心齐、骨头硬,因此名声很大。周边村子里的人用一个‘蛮’字来概括花园村的人。”

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《大国治村》之所以耐读,是因为篇篇皆有丰厚的人文历史。后陈、塘里、花园、下姜、上田之所以在浙江省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中脱颖而出,是因为涌现了像胡文法、孙朝厅、邵钦祥、姜丽娟、潘曙龙这样的时代弄潮儿。

四

习近平总书记曾说:“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,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,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。”《大国治村》思想性、文学性和艺术性兼具,能否成为时代‘经典’,暂且交给时间评判。

不过,溪的美,鱼知晓;风的柔,山知道。目前,《大国治村》已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阅读推荐书目,并参评2020年度浙版传媒好书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文题‘花开后陈’‘顾盼塘里’‘幸福花园’‘下姜起舞’和‘文武上田’,清新干净,诗意丰盈;‘谷黄一夜,人老一年’‘扁担是条龙,一生吃不穷’‘寒天不冻勤织女,饥荒不饿苦耕人’“挨一拳,得一着;挨十拳,变诸葛”‘旱苗正盼及时雨,行船偏打迎头风’‘百灵鸟不忘树,梅花鹿不忘山’等群众语言,简朴自然,雅俗共赏。

说到权力与腐败之关系,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:“一切权力不受约束,必将腐败(《论法的精神》)。”而《大国治村》则有一个“金鱼缸效应”:“政府权力应该像玻璃金鱼缸一样透明……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而且不跑出视线之外,人家才会相信你光明正大,没有暗箱操作。”浅显易懂,恰如其分。

大白话最生动,白开水最解渴。像‘门缝里瞧人——把人看扁了’‘洗脸盆子扎猛子——不知深浅’‘鞭炮两头点——想(响)到一块儿’‘爆竹上天——声名在外’等歇后语,李英信手拈来,更使文章增色不少。

李英没上过大学,这是他的短板。但他放过牛、下过乡,特别是长期供职新闻媒体,开展田野调查又成了他的长项。他说:“我已经第四次到塘里村采访,对塘里人和事的了解,差不多可以当半个导游了。”至于武义县后陈村去过多少趟,李英记不得了。他住在乡里,走村入户,沉浸式采访普通村民和干部,光与首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张舍南等采访对象的谈话录音,就整理了20多万字。

鲁迅说: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,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。”中国有大小村庄60万个,《大国治村》虽只写了浙江5个村,但无不让人想起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句话:“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,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。”

浙江的今天靠改革起步、靠开放搞活,有勇气也有能力打造‘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‘重要窗口’’,而李英的《大国治村》为人民立传,为时代高歌,也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。

明天一定更美好!